

资本商品劳动 与价值的奥秘

李鹏程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序

摇摇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论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讨论和研究劳动价值问题和商品价值生产问题的著作很多，一些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

摆在我案头的这部著作，从一个全新的视觉出发，利用数学方法对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问题进行了探讨，得到了一些新的结论，对一些争论的问题做出了新的解释，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

这部著作，从体系结构上看，除导言外，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至五章，考察了广义劳动价值论问题，第二部分包括第六至九章，考察了资本商品价值生产理论，第三部分第十章和十一章考察商品价值生产与劳动价值的关系。

为说明广义劳动价值论，作者从新的视角对劳动进行了考察。首先详细讨论了劳动的内涵。作者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劳动是人类劳动力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这一定义出发，根据自然科学中关于宇宙形成的大爆炸理论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物理学中著名的质能公式 $E=mc^2$ ，对劳动中的“耗费”二字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且得出劳动与能量消耗和转换方式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劳动是人类有意识的能量转换方式。作者对劳动内涵的这种认识，为其研究广义劳动价值论的工作提供了基础。

其次，作者从人体结构学和人体运动学出发，考察了劳动的

结构。作者认为，劳动的结构问题是以往关于劳动价值论研究的空白点。根据自己的研究，作者提出了关于劳动的二元结构理论。在过去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关于劳动，我们认识了的是关于劳动的二重性，以及劳动可以分为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而作者提出的劳动的二元结构理论认为，任何一种劳动，不论是复杂劳动也好，还是简单劳动也好，都存在二元结构，可以分解为理性劳动因子和非理性劳动因子两个部分。理性和非理性劳动因子之间是一种组合关系。从而使劳动的内涵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按照作者的观点，劳动的二元结构理论，不仅是广义劳动价值论的重要内容，也是这部著作的第二篇《资本商品价值生产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

在《广义劳动价值论》一篇中，作者还详细分析了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了商品“价值筛”理论。作者认为，从劳动价值到商品价值是通过“价值筛”的作用实现的，有了“价值筛”理论才能理解劳动与价值、劳动价值与商品价值的关系。作者就劳动价值在商品生产领域内外的不同表达进行了区分，提出了劳动价值与商品价值之间的选择和被选择关系，以及具体商品生产过程中劳动价值的表达形式。

对于劳动价值的研究，过去通常着重于定性分析，定量研究不够。作者在这部著作中引入新的定量分析方法，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定量分析框架，在这个新的框架内对劳动价值进行了系统的定量研究。作者从分析影响劳动价值的各种因素的关系入手，从中发现了它们之间隐含的联系，提出了价值长度的概念，并从这个角度分析研究了劳动者劳动价值的数量描述途径。在进行了一系列的推导之后，最后得到了关于劳动者劳动价值可能的数学表达式，为运用数学方法系统研究劳动价值问题做了有益的探索。

劳动价值可能函数的出现，使我们获得了一种评价不同素质背景的劳动者劳动价值可能的途径。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

在这部著作的第二篇《资本商品价值生产理论》中，基于在《广义劳动价值论》之中奠定的理论基础，作者认为，商品生产过程中，商品中凝结的价值量不应该是简单的初等代数相加，即： $\text{宰} \neq \text{皂} + \text{增}$ 而应该遵循能量场的运动规律，也就是矢量代数关系： $\text{宰} = \text{皂} \cdot \vec{\text{增}}$ （其中，皂表示在商品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部分对于商品价值的贡献， $\vec{\text{增}}$ 代表生产工具对于商品价值的贡献，增代表劳动力的劳动对于商品价值的贡献）。然后通过非常复杂的纯数学推导，得到了商品价值生产的表达式：

宰越皂垣曾厠
皂越槽垣栽厠原厠
增越贼垣员厠圆灾
则越圆灾猿垣灾(圆√怨垣灾垣裁)(贼原员厠)
猿垣灾(猿垣灾)

悦是一种商品生产寿命周期中，“不变资本”中生产资料转移的总价值量，也就是生产资料总的投入量。用数学表达式为：
悦越越 酃 灾分别是一种商品生产过程中，总的生产工具和设

施投入量和人力资源投入量。

应该说，商品的价值生产中，最让人着迷的不是其中作为资本的投入转移的那部分价值，即上面的皂和增，而是通过商品生产以后产生的价值增殖部分。则在对一个商品生产周期中总的价值增殖部分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之后，作者发现了商品价值生产中资本三要素运动的一个重要规律：当生产资料、技术设施、人力资源投入之间按照“黄金分割”的比例投入时，资本投入总的价值增殖取最大值——商品价值生产的第一“黄金定律”。这一结论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价值，它从价值创造的角度告诉我们，一个经济组织，如何进行资本的运行管理，才能获得最大的投资回报。商品价值生产的第一“黄金定律”还可以对国家的宏观政策制定提供价值依据，就如同作者在书中论述的那样，国民素质的提高是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关键。因此，教育事业是国家和经济组织投入的主要方向，而不是让其产业化，更不能把教育商业化。

在对总的价值增殖部分进行深入分析的时候，作者提出了商品价值生产的第二“黄金定律”。商品价值生产的第二“黄金定律”告诉我们，商品生产的平均投资回报与最大投资回报之间也遵循“黄金分割”定律的约束。从表面看，商品价值生产的第二“黄金定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是，却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因为这一结论从价值创造的角度告诉我们，在经济组织中，管理是多么的重要。因此，对于管理者来说，多一些的分配是应该的。

在这部著作的第十章中，描述了商品价值生产与劳动者劳动价值之间通过价值长度 λ 联系起来的内在联系，使其讨论的《广义劳动价值论》和《资本商品价值生产理论》完成了数学意义上的完美结合。在这一章中，虽然作者所用篇幅不多，但是，通过对商品价值生产与价值长度 λ 关系的分析，却给我们预言

了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社会经济发展将分解为资本经济和产品经济两种形态。在资本经济形态中，传统意义上的生产三要素完全脱离了其物质形态而全部资本化了，不再表现为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分化出来的这两种经济形态中，资本经济形态将占领导和统治的地位。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经济现象。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作者不是通过具体的经济现象分析提出经济发展的这种趋势，而是通过对一切财富的源泉——价值生产和创造的纯理论分析，而且是纯数学方法的理论分析得到的。因此，就更具备理论研究的意义。

可见，这是一部从全新视觉研究劳动价值和商品价值生产的著作，书中作者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对所涉及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一些具有创新价值的理论观点，值得一读。作为导师，我向广大读者推荐这本书，也希望广大读者能够提出批评意见，以利作者进一步研究探索，促进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摇宋涛

2007年 苑月

导摇摇言

摇摇资本是什么？财富又是什么？资本从何而来？财富又从何而来？这既是一对共生的古老而又非常现代的问题，也是一对回答了千遍而又时刻困扰我们的问题，还是任何一个研究经济学的人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名言是：“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当然，可以这样说，这是因为产业革命之前，由于经济发展的局限性，财富在人们的心目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而资本的重要作用并没有得到显现的缘故。由此可见，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那里，财富起码与劳动和土地这两个因素具有必然的“血缘关系”。而马克思在他的鸿篇巨制《资本论》中，一开卷就这样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①而今天来看，从某种意义上讲，资本就意味着财富。从中世纪到今天，人类就不停地探索着资本财富的本来面目和资本财富产生的源泉等问题。纵观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人类也曾经许多次地欢呼，我们找到了资本财富的实质内涵，也破解了资本财富从何而来的秘密。特别是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的问世，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几乎结束了千百年来人类社会关于资本、或者财富来源的争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页。

更以此理论为出发点，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在人类社会第一次通过理论的描述走向社会实践，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但是，进入 19 世纪 90 年代，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遭受了空前的挫折，社会主义国家要么复辟为资本主义制度，要么走向改革的道路。一时间，资本（财富）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剥削与被剥削问题，等等，归根到底还是古老的劳动价值判断难题，又向我们提出了争论了千年的问题：资本（财富）究竟是什么？资本（财富）究竟从何而来？

为了讨论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历史。如果仅仅从纯西方理念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可以追溯到西欧古代 5 世纪古希腊英雄时代的伟大诗人荷马的诗歌《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中所表达的财富理念和对劳动的态度那里，人类社会就开始了对劳动和价值的思考。而到了雅典思想家色诺芬，他在其重要的经济著作《经济论》和《雅典的收入》里，对于财富的性质和作用进行了更为精彩的描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联结资本财富的一个重要概念——使用价值。色诺芬告诉我们，笛子对于使用的人是财富，而对于不使用的人来说是没有用的。尽管色诺芬没有具体使用价值这一概念，但是，在他的讨论中，“没有用的”几个字使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价值的影子了。而更精彩的还在于，他进一步告诉我们，笛子对于不会使用的人们来说，保存不卖就不是财富，而在卖掉的时候就是财富了。从这里我们必须看到，表面上虽然色诺芬只谈到了笛子在卖掉的一瞬间的财富而非价值性质，但是，我们从现代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来看色诺芬的思想，其中就已经包含了价值的成分。也就是说，从色诺芬的思想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财富与价值之间的某种联系与区别了。然而，在以往的价值学说史研究者那里，几乎无一例外地看到的只是色诺芬思想里的财富与价值的联系，而无意识地忽略了其中的区别。今天看来，也许正是这些

无意识的忽略，使我们的价值理论研究越来越远地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当然，这是后话，也是本书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在柏拉图那里，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看到，财富的这种价值性质是如何与劳动联系起来的了。因为柏拉图在他的著作《共和国》中明确地提到了劳动的分工，并且对于不同分工的劳动产品的交换提出了应该遵循的原则，法律不会同意工艺品的制造者以提高价格来索取高于该工艺品的值，而工艺品的制造者知道他的作品所值几何。那么，柏拉图在这里想告诉我们的这个“作品的值”，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劳动的价值吗？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里，这个答案是完全不容置疑的。然而，不但历史上有许多的经济学家不这么认为，就是今天的中国，我们许多的经济学家也是不承认这一点的。也许，就是柏拉图这里的“作品的值”所带来的认识差异，就会是我们研究劳动价值论的突破口也未可知。

古典政治经济学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就产生了巨大的发展。亚里士多德研究了商品—商品的公式到商品—货币—商品的公式，以及商品—货币—商品的公式到货币—商品—货币公式的过渡。给我们描述了几乎完整的一幅商品经济运动的图画。同时，亚里士多德还明确提出了价值概念，分析了价值形式，提出了“缘张床 越员间屋，无异于：缘张床 越若干货币”的命题。并且进一步提出了“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的论断。按照我们通常的思维逻辑和惯性，总是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其实他就是要通过这些论述告诉我们，在商品经济运动中，劳动成为价值的惟一因素。因此，我们一方面“可惜”的是，亚里士多德没有能够沿着这条“路线”继续走下去，进一步得出这种等同性，或者说可通约性，就是等同的人类劳动，是不存在因分工而产生差别的人类劳动。另一方面又“庆幸”正因为没有这种结论，才使得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一步步发展，取得更进一步的成果。

不过，也许我们“庆幸”得太早了一点。如果我们回过头来，认真检讨一下政治经济学研究走过的漫长道路，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庆幸”给我们带来的所谓“灵感”，使几个世纪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曲解了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可通约性”的真正内涵，从而偏离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应有的正确轨道。当然，亚里士多德本人也许也不知道他所说的“可通约性”的真正内涵究竟是什么。

历史通过千余年的发展，到了17世纪，英国人威廉·配第第一次提出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从而奠定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可以这么说，威廉·配第的这一贡献正是对亚里士多德“可通约性”沿着我们“庆幸”的结果方向迈出的重要的一步。威廉·配第在其重要著作《赋税论》中，提出了市场价格的涨落应该是有一个中心的，那就是自然价格。威廉·配第的自然价格，即我们今天所说的价值。就价值的源泉是什么这个问题，威廉·配第认为，是劳动，是商品生产时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就这一点而言，威廉·配第对于价值与劳动关系的认识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我们后来的研究以为，威廉·配第的劳动决定价值论又具有非常大的局限性，因为他没能够认识到价值和劳动除了具有自然属性以外，还具有社会属性，从而混淆了价值与价格的界限，也混淆了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关系。究其原因，是由于威廉·配第没有能够认识到劳动具有的二重性。威廉·配第没有看到劳动的二重性，是一大失误，从而导致他不能正确认识劳动价值关系。但是，如果说财富与价值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的话，我们必须看到，政治经济学发展到威廉·配第这里，其理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相比较，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因为，“劳动之父”的地位提高了，而“土地之母”却完全消失了。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对于经济社会的实践，这样的变化究竟是“福”是“祸”，价值学说史家没有评说。但

是，这一变化对经济学最根本的问题——价值创造是具有深远的影响的，从而也影响了后人对财富和资本的认识。

关于资本或财富的性质和源泉的研究，到了亚当·斯密那里，就形成了一个整体。在他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斯密把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作为他研究国民财富的出发点。亚当·斯密认为，劳动一般，作为不同分工形式存在的社会劳动的总体是一切物质财富或者使用价值的惟一源泉。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所有的价值学说史家无一例外地都认为，亚当·斯密比他以前的经济学家，包括威廉·配第和弗朗斯瓦·魁奈更加接近价值生产的本源。因为他否定了重商主义学派关于商业和对外贸易是财富（价值）源泉的错误观点，也扬弃了重农主义学派关于只有农业劳动才创造财富（价值）的片面看法，而是认为劳动一般，或者说一般劳动才是财富的真正源泉。由此可见，古典政治经济学一步步发展而来，价值创造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变得越来越“清楚”了。这里我之所以在清楚二字上打上引号，是因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时刻都在提醒我，别忘了“母亲”。

在大卫·李嘉图那里，政治经济学最根本的财富源泉问题，也就是价值创造问题得到了更完整的发展。这位英国产业革命时期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和最终完成者，使劳动创造价值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他的重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把商品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个原理作为他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并且前后一贯地运用抽象方法考察当时经济范畴与之相符或相背的各种现象。同时，从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出发，李嘉图还说明了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之间在商品价值创造中的关系，而且指出决定商品价值的并不是每个劳动者在生产某种商品时所耗费的实际劳动，而是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必要劳动。到大卫·李嘉图这里，虽然没

有明确指出，劳动是价值存在的惟一源泉，但实际上已经完全具备了这样一种实质内涵，并对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到此，价值创造之母就完全淡出了历史舞台。就这一点，我多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作祟：女人一旦嫁人，就随夫姓，儿女当然随父姓。难道这样的姓氏逻辑也影响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我们的价值学说史研究认为：关于商品价值生产，或者说资本财富生产的源泉的理论，只有发展到马克思和他的亲密战友恩格斯的时候，才真正形成了关于劳动价值论科学的体系。马克思在他的光辉著作《资本论》中，科学地分析了商品价值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详细阐明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与包括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等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家都不同的，马克思科学地论证了商品生产中劳动的二重性，从而完成了劳动价值论的伟大变革；阐明了商品价值量的决定问题，从而揭示了包含在商品生产中的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的科学体系出发，对于资本财富运动的规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而形成了一整套关于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理论，为人类经济社会，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贡献。我们可以看出，政治经济学发展到马克思这里，使用价值与具体劳动形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价值与抽象劳动形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商品价值创造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比较，“财富之母”完全消失。

从前面的回顾中我们看到，可以说自从人类开始商品生产和交换，甚至是只有产品生产的时候，资本财富是什么，资本财富从何而来这一问题就“润物细无声”地与人类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特别是当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和商品经济阶段，由于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推动作用，资本主义社会所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在相当长的一

个时期造成的社会对立也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发展到 19 世纪初，人们对这一经济活动的根本问题的认识分歧就越来越突出，最终造成意识形态的严重分裂。

当人类社会的脚步迈入 19 世纪的高科技时代，在现代经济和社会活动中，资本就如同阿拉丁神灯里的精灵一样，具有超凡的魔力，它仿佛能满足人们的所有要求。但是，经济越发展，资本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大，因为价值创造和来源问题引起的社会分配问题就越尖锐。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基础，政治经济学就不能不面对这些现实问题。我们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提出，更重要的是回答在价值创造过程中资本为什么如此重要？资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等等这些问题是经济学家的天职。关于资本，我们可以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无一不具有现代经济社会的基本性质。从人类进入商品生产的历史阶段，从政治经济学产生的那一刻起，资本（价值）就是人类思想家研究的热点，是商品生产者苦苦追求的幽灵。随着历史的进步，资本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非凡魅力的因素，是商品价值生产过程中产生价值裂变和聚变的触发剂和主要成分。可以这么说，在现代经济社会活动中，资本无处不在，资本甚至无所不能。但是，在今天的社会生产过程中，我们往往被资本各种各样纷繁的存在形式所迷惑，而无法明确了解和剖析资本真正的含义。马克思在《资本论》这部政治经济学最辉煌的经典著作中，对于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运动进行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和论述，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人类社会的生活。同时，不论是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好，还是现代意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好，在商品生产、流通和分配过程中，资本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几乎成为商品价值生产、商品流通和价值分配过程，乃至整个市场经济的核心因素。按照马克思继承和发展政治经济学一切研究成果而在《资本论》中创造性形

成的劳动价值论及剩余价值理论分析的结果，由于商品生产过程中存在使用价值与具体劳动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价值与抽象劳动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以，资本在商品生产过程中，除了原来的价值转移之外，是不产生任何价值增殖的。因此，资本在社会经济生产和分配过程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获得大量的剩余价值分配是完全不合理的，是“剥削”、甚至是“掠夺”了工人阶级劳动所产生的剩余价值。所以，资本从来到人类社会的那一刻起，就带有血淋淋的罪恶。

如果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制度和政权的问题，使得这样的“剥削”得以维持。因此，掠夺工人阶级劳动的资本主义制度就应该与它所服务的资产阶级一道被埋葬，而且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19世纪之初，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政治经济学从理论推导得出的不可调和的经济矛盾变成社会政治变革，人类社会经历了一次大范围的政治制度重组。但是，社会的发展并没有继续沿着我们从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得到的预言进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革命，而是一步步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原来的轨迹运动。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社会不论是经济发展也好，还是政治制度也好，变得与社会各阶层的需求越来越和谐，我们从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得出的重要结论不但没有进一步发展成为现实，而且离人类社会的发展仿佛越来越远了。到今天，如果我们仍然从已有的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与价值的结论来看待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现实，那么，资本对于价值，特别是对于劳动的这种“剥削”或者“掠夺”不但从来没有停止，而且有愈演愈烈的发展趋势。我们甚至会悲哀地看到这样一种极度“扭曲”的人类社会现实：那就是，这种“剥削”甚至是“掠夺”剩余价值的资本走到哪里，哪里的经济就得到快速发展，就业就增加，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就得到提高。可以这样说，资本已经成为任何想有所作为的政府和个人梦寐以求

的理想“爱人”。所以，资本在商品生产高度社会化、全球化的今天所起的作用可以说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就全世界而言，南北之间的发展差距之所以越来越大；就中国而言，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城、乡之间的差距之所以越来越大，其中的原因也许有许许多多，但是，一个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因素就是资本在这些不同的区域的存在有巨大的差距。对于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严酷的现实逼得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资本在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泛社会商品生产和社会价值量的生产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也就是资本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是否也具有价值的增殖功能，即资本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是否能够生产价值？回答如果是肯定的，那么其价值量又是如何计量的？

提出这样的问题不但需要高度的智慧，也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因为在我们奉为“圣经”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经典理论著作中，在商品生产过程中，资本除了产生价值转移之外，就是价值创造的旁观者。应该说，不论从哪个方面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在逻辑上都是十分严密的。一百多年来，不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经济学界和哲学界，对此进行了长期的研究，结论莫过于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非常详细地讨论了商品中所凝聚的人类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二重性，以及商品中包含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二重性，从而揭示了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应该而且必须看到，马克思关于这两个二重性的发现，具有非常重大的经济学理论价值，同时具有非常重要的哲学意义。当我们考察商品中所包含的抽象劳动和商品的价值时，我们知道，“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① 马克思是这样经典地描述抽象劳动的。具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7页。

体劳动消失后，“现在我们来考察劳动产品剩下来的东西。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①“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使用价值的价值量。”^②

由此可见，商品的价值，乃至社会的总的物质的价值，与资本投入的多少没有任何关系。这也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结论。既然一切非劳动的因素都不参与商品价值创造，因此，如果非劳动因素参与到经济活动的分配中来，自然都是对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瓜分，都是对劳动者的剥削。

如果这样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那么，不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很难解释，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实际，包括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实际，有好多现象也是没有办法解释的。没有人会反对这样的情况就是经济发展的现实：资本越是集中的地方，同样的劳动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创造的质量更高的商品数量越多。因此，资本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世界经济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甚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史都是这样的。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经济建设的过程，可以说就是资本引进和积聚的过程。也可以这样说，没有资本的引进，就没有改革开放，就更没有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由于我国东部地区的资本密集程度是西部的许多倍，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资本密集度远高于农村，所以东、西部的差距，城、乡之间的差距才是如此之大。有一个形象的说法，那就是我国的东部像欧洲，而好多地方却像非洲。这种差异的出现，是资本差异的必然结果。

同时，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在我国的社会经济生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6页。

② 同上书，第106页。